

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剖析

蔡 斐

(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 重庆 400031)

摘要: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戈公振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内在要素、显著特点和深层动因,对于构建当代中国言论自由的言说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民本主义;新闻本位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1-0001-06

多年来,学界对戈公振先生的认识往往局限于爱国新闻人士的身份界定和《中国报学史》一书的史学贡献。现在看来,这种认识似乎有点粗陋和浅薄,不仅没有深刻挖掘人物的思想内涵,更谈不上还原公振先生的历史全貌和原貌。

戈公振的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动荡岁月,他虽然不是站在时代潮流中横刀立马的斗士,他却通过办报和著述活动表明自己是一名循着时代潮流前进,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的爱国志士。在此,本文以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为考察目标,着重剖析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要素、显著特点和深层动因,并研究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希望完整地勾勒出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这一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以言论自由为标识的自由主义思想

1910年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转型,新闻事业的职业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新闻学学科的逐步确立。作为当时著名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学家,戈公振始终是新闻学学科建立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他赞美言论自由的权利、渴望言论自由的实现、批判种种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最终,言论自由也成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标识被铭刻在中国新闻学的记功碑上。

(一)讴歌言论自由的权利

对于言论自由,近代国人缺乏一种原创性的贡献,后人往往将其归罪于封建专制下的言论钳

制。学者黄天鹏总结道,“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己,闭关据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1]157}，“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1]150}。万幸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坚船利炮”的伴随下逐渐地被近代知识分子当作一面救亡图存的鲜红旗帜高擎在救世大潮中。

对于言论自由,戈公振将其视为“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梯”,是中国走向文明和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和策略。在上海报学社社刊《言论自由》的发刊词上,戈公振热情洋溢地写到,“言论自由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梯,我们用这个字(词)做报名,就是很明显地表示我们的目的所在”^[2]。短短几行字,流露出戈公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渴求和呼吁要求言论自由的战斗精神。

在他眼里,言论自由乃为新闻事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认为,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在《中国报学史》的结论中,他慷慨激昂地写道,“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决无发展之机会”^{[3]359}。将言论自由看作“报界切肤之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而是建立在戈公振综合考察比较中外新闻事业历史进程后的结论。这在其所著的《中国报学史》和《新闻学》两书中都能很容易的捕捉到这样的视角,此处不作赘述。

在考察对比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延伸言论自由的权利作用,真诚地发出新闻事业要脱离政治(政党),争取独立的呼喊。对于政党报纸,戈公

收稿日期:2007-05-18

作者简介:蔡斐(1982-),男,江苏东台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新闻史学。

振向来是不齿的。他认定,报纸一旦落入政党之手,那么必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命运也自然与政党的命运紧密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甚至有些龌龊之徒,在没有得势之时舍得投资,一旦得势则弃报纸如敝履。所以,报纸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自求出路的方法则是依靠广告收入来寻求“言论独立”,走商业化报纸的道路。当然,以商业化之路寻求经济利益显然不是公振先生的目的,他的目的很简单,也很纯粹——报纸独立,仅仅是报纸独立。

无论是日常办报、游历考察,还是教徒讲学、著书立说,戈公振一直非常重视言论自由。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时代与后人。学生杨季在回忆戈先生时说,“惟兹届其逝世纪念,忆及先生生平从业报界,思想上更有一特点,可来一提,藉以略表追念之意。此特点为何,即其异常重视言论自由是也。自由乃人类为人人所视为宝贵而应爱护的,戈先生在报界服务二十余年,对之重视,每尤甚于他人。……上课之时,时常闻其倡导言论自由,彼认为欲谋报业前途之光明与发展,非任之有自由刊载新闻,发表言论不可。意态之间,对于拥护报业之自由,异常具有热诚。……而戈先生崇尚自由之思想,乃系大公无我,异常纯洁,自非世之假借自由之幌子,以便利私图者,所可与相比拟也”^[4]。

(二) 批判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块历史的界碑,它标志在共和时代的来临。在新闻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言论自由的理念正在转变为一种实践。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仅将言论自由写入宪法,加以倡导和推行,而且顺应民意,明令撤消了不合理的《暂行报律》,以行动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

可惜的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很快就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夺。报界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瞬即被抛入寒冬之中,大批报社被查封,诸多报人被迫害,《报纸条例》、《出版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相继出台,历史上称之为“癸丑报灾”。面对这一严重破坏言论自由的倒行逆施,戈公振表示出极大的愤慨,“自洪宪以来,军人柄政,祸乱相寻……封报馆、扣报纸、检阅电函,十余年来,屡见不鲜。”^{[3]359},直接的结果则是导致了“报纸不是阿谀奉承,就是模棱两可。仿佛舆论消沉,人

心已死”^{[5]14}。不仅如此,他更居于现代国家政治的角度提醒社会,也包括提醒统治者——“盖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既久,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枯荣系之”^{[3]360}。

同时,对于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动辄以“赤化”、“过激”罪名严禁共产党报刊、革命报刊出版发行的举动,尤其是对枪杀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等迫害言论自由的作法,他比较了国外报界的现状,悲愤地斥责到,“英国有以《红旗》名报者,德国有以《炸弹》名报者,国会中有共产党,而其政府不之禁;今欲假‘赤化’摧残言论自由,乃无意识之下焉者也”^{[3]359}。

戈公振是痛苦的,理想中的言论自由在现实的“阅大样,捕记者、检查邮电”等种种行径中惨遭蹂躏,然而,在过往的中国言论史上,言论自由又几曾得实现呢?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他以民主政治的坐标对中国古代官报作了详细的考察。“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不发达?……进一步而言,官报唯一之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3]63}。寥寥数语,封建统治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执政秘诀昭然若揭。

(三) 呼吁为实现言论自由而斗争

在种种扼杀言论自由的行径面前,戈公振没有消沉,相反,他从容地应付着时局,并勇敢而激昂地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实现而大声疾呼。“吾意服务报界文字方面之人,既以先觉自命,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坚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有背弃者共斥之,使其不齿于同类。总之,在位者不论何人,绝不喜言论自由,其摧毁也亦易。一方面固在报界一致团结,以与恶势力抗,而另一方面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随时防止恶势力之潜滋,不稍松懈。……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3]359-360}。这番话蕴涵着深刻的意义: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从本职出发,以“宁为玉碎,无为瓦全”的气概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团结一致地努力,从而实现新闻传播事业赋予的使命。二是广大国民必须作为新闻事业的后盾,必须将实现言论自由当成本职工作,同仇敌忾,共同进退。

很显然,戈公振在这里没有狭隘地将争取言

论自由的实现局限在知识分子等少数的精英群体身上,而是将呼喊告之天下,号召所有国民以“天职”般的责任感为言论自由之奋斗。这一观点不仅和戈公振提出的报纸服务民众的思想遥相呼应,更流露出作者明晰言论自由乃是公民之权利、群众之权利、人民之权利的政治意识。

二、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与动因

如果只是从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内在要素的只言片语来洞悉其特征和动因,应当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就好比从历史的一个横断面来观测整个历史一般,是相当难以完成的工程。此处,我们充分发掘出人物思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试图借此作出深入而细化的分析。

(一)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

总的说来,戈公振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裹挟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的,而自由主义正是五四运动的一大精神动力,抑或是一面精神旗帜。受五四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戈公振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由于个人性格、文化背景、从事职业的差异,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些都成为其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

1. 功利主义夙求越位

五四运动不止是简单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从1915年早就开始,当时是一场以启蒙为性质的运动。而待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运动性质便已由启蒙走向救亡,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身体力行地呐喊和奔走,戈公振也不例外。

根据多年的办报经验,戈公振提出报纸乃是社会公器,有着“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的天职。报纸是全体国民的喉舌,是一般国民公共意志的传递器。换言之,无论“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其严格置于“社会公器”及“社会公人”批评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功能,其本身必须获得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西方自由主义随着五四运动的引进正好成为戈公振手头得心应手的武器,有力地向现实中反言论自由的敌人挥舞而去。

不过,细究下来,这种观点显示出强烈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色彩,即片面地注重言论自由的工具性价值,而很少顾及西方自由主义所强调的

价值合理性。另外,如果说严复等早期自由主义者身上还存在着达尔文主义的渐近思想的话,在戈公振这里,则表现出一种激进色彩,他将言论自由的意义看得太重,认为是“报界切肤之问题”,希望通过团结与努力使言论自由在中国一蹴而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言论自由仅仅被戈公振当作一项工具被引入新闻事业争取权利和参与政治的运动中,这事实上也表现出戈公振为维护新闻事业独立的急切心情。

2. 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我们的问题是救国,就这个衰弱的民族,揪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中,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的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要材料可用,不管材料来自何方。”^[6]既然拯救民族危亡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在急切的心境中,自由主义好比一根救命稻草,仿佛济世良方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广泛采纳,成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背后的“李先生”(Liberty)。

同样,面对着五四运动后的新一轮报业繁荣,在报界历练多年的戈公振没有被这繁花似锦的表面现象冲昏头脑。他的心里还念念不忘北洋军阀统治下报业遭受的摧残,邵飘萍和林白水的鲜血还历历在目,如何让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的问题一直横亘在他心底。这时,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出现并成为潮流时,这宛如黑暗中的一缕阳光,让戈公振看到了新闻事业独立自强的希望。他天真地以为一旦获得了言论自由,阻碍报业发展的桎梏便能够土崩瓦解。他设想到通过言论自由的努力,将来的新闻事业可以走向更加独立和超然的美妙境地:“所以将来社会进步,人民知识和道德的程度日高,报纸虽不必收归国有,却可由公众推举道德家、法律家、新闻家和优秀的新闻记者等人,共同主持编辑事务,就是希望这种报纸,真能发挥民治精神,有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的无上权力,不为任何势力所左右……这也就是我们对于报纸的一种理想。”^{[5]39}

这种语气是一种憧憬和希望,换言之,这种理想与戈公振一直以来对中国报业的将来表现出的乐观态度十分契合。但从某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戈公振对摆脱危机的渴望远远胜过对长期性问题的思考,他的理想无论是在当时之时代,还是在他希望报纸走商业化道路之后,都是不切实际的

主观愿望,游离在客观诸多条件的限制之外。至于他希望在资本社会中报业将能达到“真正发挥民治精神”,则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幻想。

3. 民本主义成分显目

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7]的确,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

但是,当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盲目和激情退去,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之际,戈公振开始理性地探求西方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尤其是言论自由权利的归属问题。最终,他自觉地得出结论——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即广大国民才是言论自由权利的最终享受者,而报纸更是表现一般国民公共意志的代表。

此刻,惯常的民族主义立场让位与民本主义的理性思考,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让位于普通大众的权利探寻。这种民本主义思想超越了当时时代的局限性,它在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吸取了足够的有益成分,促进了言论自由学说的本土化和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是一种中国式的思考和改造。它一改近代中国言论自由学说中普通民众基本缺席的局面,纠正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忽略个体的错误倾向,标示出言论自由理想变为现实的有效路径,有着很强的理论导引和实际操作作用。今天看来,这种前瞻性观点依然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比较下来,这一观点应当也是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中最璀璨夺目之处。

(二) 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层动因

必须强调的是,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特定的生存土壤和内在动力的,而并非其个人先知先觉的一番幡然醒悟。此处,我们选定“立足新闻本位的忧思”和“双重文化背景的影响”两个维度来追溯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层动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点只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营养成分最简单而概括的表达,限于篇幅,其余的因素无法详尽地逐一列举并仔细分析。但必须明确的是,其余的因素和以下的两点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包容、彼此缠绕、互为存在和前提的,是它们的合力成就和发展了戈公振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

1. 立足新闻本位的忧思

自中国新闻学意识启蒙以来,新闻事业与政

治往往是同一个意思,“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就是明证。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没有必要如同传统文人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8]。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自由和自我责任感,报纸政论的主体地位被新闻报道取代,言论和政治开始若即若离,报人开始以“不偏不倚”的眼光打量政治,新闻事业开始逐步跨入“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中,戈公振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旗手,他对于从事新闻事业和从事政治事业有着严格的区分,表现出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他认为,新闻一旦和政治挂钩,便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进而也就丧失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更不可能成为一般国民公共意志的代表。有人可能误解这是戈公振对于政治的极端不信任的表现,这是不尽然的。只是在戈公振眼里,新闻事业好比自己的生命,是魂之所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对于还新闻于本位的工作,他时刻都是摇旗呐喊,身体力行。所以,一旦把握了言论自由这柄锋利的兵刃后,他犹如一名斗士,开始用这武器来防卫,来反击。他不愿意再看到自己热爱的报业再被蹂躏,不愿意再看到自己的同行再遭迫害。

在推进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为人谦逊的戈公振酣畅淋漓地挥洒着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忱之情,大有敢为人先的侠士风范。不过,透过表面,他的大声疾呼,他的悲愤痛斥,他的真诚歌颂,隐藏着的是他对于新闻本位的深切忧虑。而后来直至今日,正如戈公振所担忧的那样,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切好象又回到了原点。

2. 双重文化背景的影响

学者黄玉顺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既有自由主义、又有民族主义,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既是个体主义者,又是集体主义者。这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现象”,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9]。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背景是民族文化的影响,而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精神背景则主要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五四知识分子几乎人人皆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既从小受诗书礼乐的熏陶,后来又受欧风美雨的浸润,于

是形成了他们的那种双重精神品格。

这一点在戈公振身上有着清晰的生长轨迹：出生在江苏苏北小县城的戈公振，自幼就跟随伯祖母翟太夫人设立的“弢庵家塾”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六岁进入同里杜晴波学塾学习，熟读四书五经。戈公振十四岁进入东台高等学堂读书，待到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学校给戈公枕披红挂彩，用轿吹抬回家”^[10]。青少年时，他还跟随伯父戈铭猷学习生活，深受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熏陶。1904年，学校曾以“巴拿马华工备受洋人凌辱，惨死异乡”为题要求学生作一篇文章，少年的戈公振当即写下了“我亦有土，何必力尽海边；家非无坟，突为骨埋山岛”的佳句。这短短二十字已经足够说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早已铭刻在少年戈公振的心底。1913年进入上海报界后，他又刻苦学习外语，成为“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虽仅一万余字的新闻理论阐述，但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由此一斑，可见戈公振又深深地被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他对中国报业的种种病态曾作了文化上的解释：“从社会思想方面观，各种学说，纷纭杂错，目迷五色论其学理，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其果适合于我国国情否，果适用于我国今日之人否，是尚不能无所踌躇。身为记者，于此应先下一番研究功夫，以徐待事实之证明，若根据捕风捉影之谈，人云亦云，漫为鼓吹相攻击，其不为通人所齿冷也几希。从科学方面观，可谓最无贡献。……今日之报纸，惟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矣。”^{[13]196-197}这种分析显然就包含着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念。

正是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双重影响，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荡涤后，戈公振身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呈现出一种冲突和融合的特色。试举一例，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对我国没有一家能够担当重任的通讯社表现了极度的担忧，他叹息到“从中国对外言论方面观，路透社实际上做了中国的代表”^{[5]24}，他继而提醒国人——“我们要一种觉悟，以国家为前提，由政府 and 报馆协力合作组织一个大规模足以代表全国的通信社，一方面以中国真实消息，供给全世界；一方面组织外人在中国宣传。如此，我们的新闻界，方有自立的机会”^[11]。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表现。此

时，他从构建世界传播秩序的角度出发，以国家为中心，将言论自由的权利整体化地赋予了民族这一概念。而等到中外矛盾有所缓和，他又“还权与民”，认为言论自由的权利属于一般国民，表现出对政治（政府）不完全信任的态度，这时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又占据了他的大脑，而追根究底，则是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殷海光在分析中西自由主义时，就对这种异地文化染色的现象深刻地论述到，“中国社会里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有共同的地方，但二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某一个社会文化里滋长出的观念、思想和学问，传到另外一个社会文化里以后，因受这一个社会文化的作用，而染出不同的色调”^[12]。这样的解释，用来回应双重文化心理引发戈公振的特定自由主义思想再合适不过了。

三、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戈公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悄然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如若重新打捞和审视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产，我们所做的应该不仅是景仰和感叹，重要的是“以史为鉴”，探寻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如果我们将戈公振生活的年代和当下的中国比较，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学界界面上，私底下（尤其是私底下）充斥的仍旧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只不过当年强调的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今天关心的是对现实构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言论自由观只是作为一种官方的理论，被搬入教科书，而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近当代中国言论自由言说旨向的依然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这种现象一方面显示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顽强的生命力和富有张力的学术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国内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思想的不断探索和学习。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学习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是有益的学问，我们都应当引进，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系统工程中发挥其作用，关键的是，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纷繁芜杂的思潮。

历史上，我们曾不顾国情，照搬苏联集权模式下的言说框架，结果造成当时言论自由近乎窒息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某些学者和政治人士又试图采取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形式来构建中国的言论自由的言说框架，却因不顾社会的

制度环境中途流产^[13]。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警醒给予的教训,即如何在学理中一方面有效地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一方面又能在现实中真正地推进中国特色言论自由的言说框架的完善。在这里,我们回望戈公振自由主义思想,或许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作为一个参照系,像戈公振那样对其进行中国式的本土化思考和改造,使之与我们的国情相适应,只有这样,也唯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言论自由之路。到那时,言论自由就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不仅是可期待的未来的理想,而且是可感知的当前的现实。

参考文献:

- [1] 黄天鹏. 远生遗著[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
- [2] 陈镐汶. 戈公振与上海报学社[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4):142-149.
- [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上海:三联出版社,1955.
- [4] 杨季. 戈先生与《言论自由》[M]. 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四集,出版社不详,1990:175.
- [5] 戈公振. 新闻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6] 胡适. 自由主义[N]. 世界日报,1948-9-5(4).
- [7]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14.
- [8] 陈力丹. 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J]. 新闻战线,1989(6):37-39.
- [9] 黄玉顺. “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J]. 学术界. 2001(3):23-33.
- [10] 洪惟杰. 戈公振年谱[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3.
- [11] 戈公振. 中国急需一个代表通信社[M]. 江苏文史资料第四十四集,出版社不详,1990:199.
- [12]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三联书店,2002:256.
- [13] 唐海江.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新论[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285-286.

An Analysis of Ge Gongzhen's Liberalism

CAI Fei

(News Communication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Ge Gongzhen's liberalis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journalism. Research into the intrinsic elements, the notable features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his liberalism is beneficial to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liberalism; utilitarianism; people-oriented; news-oriented

(责任编辑:李军;校对:丁小玲,沈爱琴)